



读史札记

智能勿成
亡身之具

□ 滴水水

“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盖俗之量，则儆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刘弘仁、范蔚宗（范曄字蔚宗），皆怀志而贪权，矜才以徇逆，累叶风素，一朝而损。向之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具矣。”这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完范蔚宗等人叛逆过程后，引用南朝著名史学家裴子野的一段评论。意为有超人之才的人，必想要有冲天的发展；有超出世俗气度的人，就不愿居平庸的下位。要这样的人守礼遵法，几乎不可能。刘弘仁、范蔚宗就是这类人，心志骄傲，贪求权力，矜恃才能，徇私叛逆，历代积累的名誉声望，一朝而败落。正所谓智能反而成为亡身的工具。这是对范曄一生精辟的评论。

范曄是南朝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是《后汉书》的著作者。“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一生才华横溢，享誉朝野，受人仰视。其著作《后汉书》，博采众史，结构严谨，属词丽密，为文简明而周详，叙事生动，书成即取代以前各家后汉之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他确实具有超人的智慧和才能。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已委任深重的他，志意不满，参与谋逆，事泄被诛，祸及三子，其超人的智能反而成了亡身之具，令后人深思。

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即理也。孔圣人说得对，人生在世，都会有欲望，合理的欲望叫天理，过度的欲望叫人欲。一个人要去人欲存天理，谨守内心的良知，知善则行，知恶则止。相比于智能平平的人，智能超人之人，往往想得多，欲望大，而利欲过盛，则如黄庭坚所言：“利欲熏心，随人翕张。”范曄的教训就在于此。

首先，他恃才图利。范曄的哥哥范晏经常说：“此儿进利，终破门户。”此次谋逆案的始作俑者，是职轻位卑的员外散骑侍郎孔昭先，“而昭先素不为曄所重”，范曄根本看不上孔昭先，孔昭先想见范曄都难。可是，“曄外甥谢综，昭先曾经相识，乃倾身事综，与之结厚。昭先藉岭南遗财，家甚富足，始与综诸弟共博，故为拙行，以物输之。综乃引昭先与曄为数，曄又与综，昭先故为不敌，前后输物甚多。”《宋书》的这段记载，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孔昭先以豪赌故意输财给范曄，在私利的驱使下，范曄对孔昭先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看重孔昭先，而且“情好款洽”，成为莫逆之交。宋文帝刘义隆知其谋逆后，说了这样一段话：范曄一贯品行不端，青年以来一直名声丑恶，只因他有点才艺，故予以重用，多次赐给他荣华和爵位，以至到了今天重要的位置。但他险恶好利的贪婪之心，比大山谷还难填满，最后竟然与他人狼狈为奸，疯狂反逆到如此地步！可见，恃才图利，让范曄走向了深渊。

其次，他恃才谋权。如果仅仅因为图利，范曄不至于走上逆反之路。可是，私利是魔鬼。随着孔昭先的全力伺候，“曄遂相与异常，申莫逆之好”。到这个时候，孔昭先说出了他的谋逆之意。“曄甚愕然”但孔昭先用毛玠事曹操、张温事奉孙权而受到陷害侮辱为例，说范曄受本朝当权的任用，还不如毛、张。“丈人奕叶清通，而不得连姻帝室，人以大家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为之死，不亦惑乎！”孔昭先连续刺激范曄的权欲，“曄默然不应，反意乃决。”他不发声却心里在发狠。东窗事发后，宋文帝审问他的时候，范曄用“此地无银”的伎俩，吐露了心声：“臣位过重，一阶两级，自然必至。古人云：‘左手握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臣虽凡下，朝廷许其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范曄就是没有“以理而察”，妄想据有天下，才被人把刀架在了脖子上。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周纪一》中说：“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恶亦无不至矣。”可见，对于智慧才能，先哲早就认为是把双刃剑，关键在于德，品德高尚，挟才为善，惠及天下；品行恶劣，挟才为恶，恶及自身，故而智能反成亡身之具。

才俊之士，定要以范曄为鉴！

“北江”“曲江”“丹徒江”

——长江镇扬段历史上的别名探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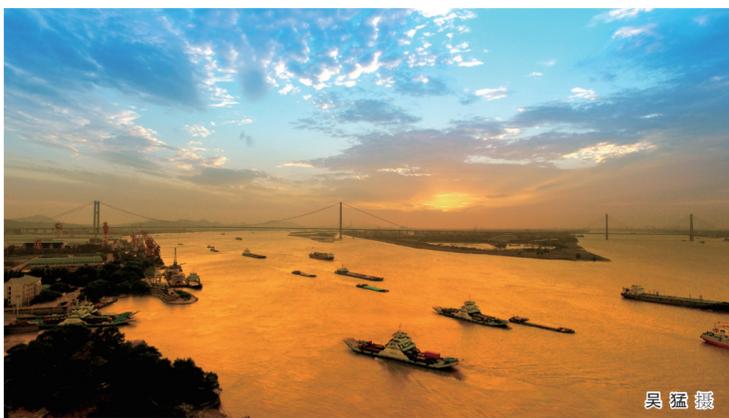
□ 乔长富

万里长江，东流入海。镇江、扬州，一南一北，共饮一江之水。两地之间的这一段长江，历史上曾有过多个别名，有的是从江南的角度命名，有的是从江北的角度命名。了解它们，对于了解古代镇江扬州地区的长江文化，以至相关的历史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别名，从相关的历史文献看，最早当是“北江”，然后是“曲江”和“丹徒江”，最晚的则是“京江”和“扬子江”。这里先探述“北江”“曲江”和“丹徒江”。

北江

北江是今天所见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到的古代镇江、扬州间这一段长江的最古老的别名。它的名称及有关情况，始见于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篇。文章说：“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意为：大禹疏导汉水等使之流向东方，汇合为彭蠡泽即鄱阳湖。彭蠡泽向东的江为北江，流入大海。）至于“彭蠡泽”以东的长江称为“北江”，从《尚书·禹贡》篇说“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意为：淮河与大海之间的地区是扬州。鄱阳湖汇集了多条河流，如同北方的候鸟来此栖居。然后震泽即太湖的水利工程获得成功）。文中所说“三江”，“南江”在清代时称“松江”（参《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之《苏州府·松江》）；“中江”“自芜湖县东流入县北，又东迤溧阳县界，自唐宋时筑银林五堰，中江遂不复东”（参同上《江宁府·溧水县》）；“北江”在常州府武进县“县北，自镇江府丹阳县流入”（参同上《苏州府·武进县》），“大江”在“（丹徒）县西北自江宁府句容县界流入，与扬州之江都县分界，又东迤丹阳县常州府界”（参同上《镇江府·丹徒县》）。由此可见，“北江”就是指主要流经镇江、扬州间的这一段长江。这一段长江，后来成为长江下游的主干（参《辞海》《辞源》）。而这段长江古代之所以称为“北江”，显然是由于它在南京和中江之北而得名的。

说到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厘清。那就是，对于《汉书·地理志》所说“江至毗陵为北江”，由于毗陵“本名延陵，汉改曰毗陵”，“晋武帝太康



吴猛摄

二年(281)，省校尉，立以为毗陵郡，治丹徒。后复还毗陵（引者按：指晋陵）。……永嘉五年(311)，元帝改为晋陵，始自毗陵徙丹徒。太兴(318-321)初郡及丹徒县悉治京口。都督裴复徙丹徒。”（以上据《宋书·州郡志》）在这种情况下，“毗陵”所指究竟是“延陵”（今丹阳）或“晋陵”（今常州），还是“丹徒”或“京口”（今镇江），后人也就有不同的说法，因而对“北江”所流经的究竟是在常州还是在丹徒之北，也就有不同的说法。在相关说法之中，《光绪丹徒县志》卷三所录唐代徐坚《初学记》说：“《汉书·地理志》：‘江至徐陵为北江’。又《荆川记》云：‘东北至南徐州为北江’。又《荆川记》云：‘东北至南徐州名为北江，而入于海也。’”该志又录吴淑注《南徐州记》说：“京江，《禹贡》北流也。阔漫三十里，有大涛，声势壮，至江北，激赤岸，尤更迅猛。”并录桑钦《水经》说：“河水分为二，其一东北流，其一又过毗陵县北，为北江。”则道元注：“《地理志》曰：毗陵县，旧丹徒之属县

丹徒县也。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旧去江三里，岸稍毁，遂至城下。城北有扬州刺史刘繇墓，沦于江。江即北江也。”由此看来，所谓“北江”当是指流经丹徒和常州之北的那段长江。因此，《辞海》把“江至毗陵”之“毗陵”释为常州，但又引徐锴《说文系传》说“江至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为北江”，不免自相矛盾。之所以如此，当是未能全面理解相关文献所致。

曲江

曲江之名，最早见于汉文帝和景帝时，文学家枚乘所作《七发》，文中说：“客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兄弟，并往观乎广陵之曲江。’”《文选》李善注：“广陵国，属吴也。”《宋书·地理志》：“广陵太守，汉高六年（公元前201年）立，属荆国。十一年，更属吴。景帝六年（公元前153年），更立广陵。”《光绪丹徒县志》卷三：“曲江，或曰钱塘江。然本文明曰‘广陵’，选注明曰‘吴地’。”由此看来，“曲江”得名的时间当不晚于西

汉前期。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从扬州角度给相关长江段起的别名。

至于扬州与镇江之间的这段长江，在古代之所以称为“曲江”，《辞海》说是“古时以水流屈曲得名。”今天看来，这一说法还只是说到表面上的情况。事实上，之所以称为“曲江”，当是由于这段长江的江岸，特别是北岸，在古代，从广陵西部开始一直弯曲向大海（参有关历史地图），弯曲幅度较大，并形成喇叭口，所以水流屈曲，并且在“八月之望”即农历八月十五形成大潮，称为“曲江潮”或“广陵潮”，其势如同今天的钱塘潮。因而宋代米芾有《观潮》诗，就是写的“曲江潮”即“广陵潮”或“京江潮”。如果以为米芾所写的是钱塘潮，就误解了。

“曲江”虽得名于西汉初年并见于《七发》，但看来还不大流行，因而汉代和六朝诗文中除《七发》以外，很难看到其他称扬州曲江的作品。虽然如此，“曲江”毕竟是古代镇江扬州间这段长江最早的从扬州角度起的别名，因而值得注意。

丹徒江

《光绪丹徒县志》卷三：“大江……亦名京江，又名丹徒江。徐坚《初学记》：‘长江有别名，则有京江；江带郡县为名，则有丹徒江。’”由此可见，丹徒江的得名，是由于它流经丹徒县北。按《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丹徒，令。本属晋陵。古名朱方，后名谷阳，秦改曰丹徒。孙权嘉禾三年(234)，改曰武进。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复曰丹徒。”根据这一记载以及上文所引郦道元《水经注》说毗陵古名“丹徒”，“毗陵县……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江即北江也”，可以看出，古名“北江”的丹徒县北的这段长江，后来又称“丹徒江”。而“北江”之改称“丹徒江”的时间，当在西汉之后到南北朝时期。“丹徒江”是继“北江”之后，从古代镇江的角度给流经丹徒县北境的这段长江起的又一个别名。与“北江”不同，“丹徒江”是“带郡县为名”。至于“丹徒江”的得名时间，当不晚于南北朝时期。



1950年，宝塔路碉堡前听广播

走进宝塔路的烟火气

文/于锡强 图/陈大经



1982年的宝塔路路口



2003年的宝塔路路口

老照片

镇江有几条老马路，应是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味所在。老马路承载着岁月沧桑、世事变迁，还有人间故事。宝塔路那熟悉的人和事经常从我脑海里跃出。

宝塔路始建于1934年，从浮桥巷至宝盖路全长621米，1946年铺柏油。因南端丁字路的寺庙前有宝塔形的香炉而得名。

宝塔路与大西路交汇口的广场每年元宵节前四周便会摆满造型各异的手彩灯，有兔子、蛤蟆、金鱼、荷花、龙等，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并延续至今。傍晚陆续有卖馄饨、汤圆、豆腐脑、回炉干、熟菜的出摊，其中熟菜的猪头肉、烤鸭的头颈瓜翅是下酒的好菜，最受欢迎。白天路口还有修车、补衣、修鞋、配钥匙等摊子。西南角是副食品商店和潭森和酱园，1956年全市庆祝公私合营集会在店前搭台，会后有盛大的游行；西北角是牙科防治所（口腔医院前身）和无

线电修理部，我常去看师傅修电器，货架上放着修好待修的各式大小不一的收音机、扩音机等，工作台上师傅正修理收音机，机内排列着电子管或大小电阻、电容等，我呆呆地一看就是大半天。看多了就自己想试试，于是经常到东北角的五化交商店电器柜寻购相关的配件，陆续选购了耳机、活动矿石、二三极管、扬声器等零件，按图索骥先后安装了矿石和半导体机。既增长了知识也丰富了生活。

1983年元旦新建的五化交大楼开业，头天晚上就有人排队买热门的“燕舞”收录机。开业时人头攒动的火爆场面仍记忆犹新。

西南角是水果店和茶食店，我偶尔会去消费一下，满足一下口腹之欲。

往前走就是宝塔路饮食店，烟火气是从清早就氤氲开的。一开门顾客相继涌入，排队买粥、取面点，烧饼、油条洋溢的缕缕香气随风飘来，还有掀开蒸屉盖水汽缭绕中包子的鲜香。下面的老吴技术过硬，足以俘获众多食客的胃。店内座无虚席，老少皆有，面前清一色的蓝边碗内流动着的面劲道柔润，让人味蕾为之雀跃，锅盖面蕴含着特有的色香味使食客大快朵颐。许多人停车歇担进店吃饭，还有下人搪瓷缸、钢精锅带来的。

印象最深的是该店从外学来的北京炸糕风靡一时，每天下午食客排队队长争相购买。用糯米粉裹豆沙馅的油炸糕，现炸出锅，金黄的色泽格外诱人，外脆内甜，咬一口，满嘴充盈着甜甜的豆沙，大人孩子都爱吃。若是去晚了便买不到了。

宝塔路每隔几十米远就有一条巷子，纵横交叉的巷子长短不一，首尾相连、内外相通，却有着不同的名称、来历和故事。

巷内的居民走走走出，有骑自行车上班的工人，有背书包的学生仔，有拎菜篮的主妇，有挑着担子、背箱子的手艺人……烟火气把他们从巷子里带到宝塔路。

各类商店抚慰了民生。烟纸店、理发店、裁缝店、粮店、南货店、煤球店、石灰店、毛线店、拉链纽扣店……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一车车装满冒着热气的醋渣酱渣的麻袋从巷内拉出，那是附近恒顺车间的下脚料，还有豆制品厂的豆渣。

宝塔路横街传来一群放学孩子银铃般的欢笑声，既是昨天又在今天。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宝塔路旧貌换新颜，路面也拓宽了，烟火气仍是宝塔路最质朴的气质。老百姓日常需要的主副食品从蔬菜瓜果、

肉蛋鱼虾，到熟菜、炒货、粮油等应有尽有，餐饮店供应面条、包子、馒头、锅贴、麻团、糍粑、大饼等，摊春卷皮的几个大嫂在麻利地制作，既有技术性又富观赏性，周围常围着人观看。烧饼依然是记忆中的品相和味道，深受欢迎。还有灌香肠、裹粽子、预订寿桃的。维持包子、鱼圆、香干臭干、大头菜等一脉相承的味道依然受青睐，瞬间唤回我久远的记忆，甚至串起了当年生活的点点滴滴。

烟火气引来旺盛的人气，并勃发生机，宝塔路依然有欣欣向荣的第二春。

